

法显及其《佛国记》的几个问题

靳 生 禾

法显，我国东晋时期的高僧，杰出的翻译家和旅行家。法显以其和邻邦人民交往中，扩大了人们的地理视野，促进了国际友好交流，为中外人士所称颂。法显以其游记《佛国记》的学术价值，见重于世界学术界。然而，法显是以佛教人物出现的，在当时社会上知道他的人是不多的，官修史传中更不可能多说到他。因此，有关法显生平的资料十分缺乏，他的著作的研究亦受到局限。本文试图对法显及其《佛国记》作点探讨。

法显的故乡

僧祐《出三藏记集·法显传》，说他是平阳郡武阳县人，后来慧皎《高僧传》、智昇《开元释教录》、园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皆从之。僧祐治学严谨，作传至迟在公元480年，晚于法显不过六十年，其说可信。

案平阳为今山西临汾。但查《晋书·地理志》、《临汾县志》等，平阳设郡始于曹魏，下迄姚秦，所辖县中无武阳。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未说及武阳。疑武阳为平阳之误书，因东晋、前秦、后秦时，平阳郡所辖县中都有平阳；抑或武阳为武遂之误，因平阳境内西南有武遂镇。日本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及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都指武阳为今山西襄垣，不知何据？抗战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亦谓武阳为今山西襄垣，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编《辞海》“法显”条，亦持此说，但均未提出依据。

这里应注意的：

1. 襄垣从来属于上党郡，而不属于平阳郡；
2. 无论武阳是否平阳抑或武遂之误书，“武阳县”应属于平阳郡而不属于上党郡，这是无可争议的，因“武阳”之上已冠以“平阳”。

一言以蔽之，法显的家乡“武阳县”，应为山西临汾一带较妥。

法显的行程

《佛国记》说：法显从长安出发，经六年到中（天竺）国，留学六年，回国时历三年，达青州。凡所游历，将近三十国。法显所经古国及当今地名（参《牛津地图》）如下：

长安	(西安)	毗荼国	(待考)
乾归国	(甘肃靖远)	摩头罗国	(印度新德里东南之马土腊)
傅檀国	(青海乐都)	僧伽施国	(印度德里东南之埃塔伐)
张掖镇	(甘肃张掖)	沙祇大国	(印度法札巴德)
敦煌	(甘肃敦煌)	拘萨罗国	(印度北部巴赖奇附近)
鄯善国	(新疆若羌)	兰莫国	(尼泊尔南境)
佉夷国	(新疆焉耆)	毗舍离国	(印度彼沙尔)
于阗国	(新疆和田)	摩竭提国	王舍城(印度纳伐达附近)
子合国	(新疆叶城)		伽叶城(印度加雅)
於阗国	(新疆蒲犁)	迦尸国	(印度瓦拉纳西)
竭叉国	(新疆喀什)	拘唎弥国	(印度阿拉哈巴德西南)
陀历国	(克什米尔达利尔)	摩竭提国	巴连弗邑(印度巴特那)
乌菴国	(阿富汗芒克阿)	瞻波大国	(印度巴加尔普尔)
宿呵多国	(巴基斯坦西北境,白沙瓦北面的赛杜附近)	多摩梨帝国	(印度米德纳普尔之泰姆鲁克)
健陀卫国	(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西之塔克西拉)	师子国	(斯里兰卡)
竺刹尸罗国	(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西北)	耶婆提国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或爪哇)
弗楼沙国	(巴基斯坦白沙瓦)	青州牢山	(山东青岛)
那竭国	(阿富汗贾拉勒阿巴德)	建康	(南京)
罗夷国	(巴基斯坦白沙瓦南之拉基)		
跋那国	(巴基斯坦西北部之哈拉纳)		

由此可见,法显的旅行,由公元399年起,发迹长安,穿行戈壁,越葱岭,周游五天竺,再泛海南下师子国,东渡印度洋,经耶婆提,绕行南洋,然后经我国南海与东海,在山东半岛牢山登陆,最后于413年到达建康。历时凡十五年,约经三十个古国,行程四万余里。旅行范围包括了我国的西北、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实属一次横贯中、南亚大陆兼括南洋的伟大旅行。其所以伟大,固然由于法显此行历时之长久,行程之遥远,经涉之艰险,为有文献记载的中外历史上前此所未见;也因为法显这次大旅行是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古时代,当人类十分缺乏地理知识、交通手段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完成的。试看,他强渡大戈壁时“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越葱岭时“毒风雨雪,飞沙砾石”,参访迦维罗卫时“道路畏白象、师子”,渡印度洋时“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等惊险情景,人们便可体会此中需要多少顽强和毅力!真是艰苦卓绝,令人感奋!

我国到达南亚三国的第一人

法显越过葱岭后，充满感慨地说：“九译所绝，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

张骞通西域，也横越了世界屋脊的葱岭，到达了中亚。但是，这位勇敢的博望侯当时还未能知道印度的确切方向。《汉书·张骞传》记载他回国后向汉武帝述职，汇报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博望侯是在中亚发现了转道印度来的四川竹杖、细布，才开始知道印度大概的地理方位的。他回国后就奏请汉武帝派他通西南夷，本意即通印度，只是未及实现就死了。班超最远到过疏勒。甘英到达亚洲西部，伸远了张骞打通的西方交通路线，却未达南洋。后来，汉晋间中国西行的僧人，最远不过到达北印度。三国时代的朱士行，足迹仅达于阗；东晋初的康法朗未闻到印度；于法兰、于道邃中途死于中南半岛；法领、法净远适西域，但行程无具体记述。

以上说明，虽然我国和南亚往来可以追溯到汉代，但法显则是有文献记载的到达中印度、到达斯里兰卡、到达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人。当法显还在毗荼、祇洹精舍的时候，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僧俗人民就赞叹他们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位中国人。梁启超说：“法显横雪山以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

（《饮冰室全集·佛教时代》）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帕拉纳维达说到有史以来访问斯国的中国人时，首举法显（《锡兰简明史·绪论》）。印度尼西亚学者甯榕·沙勒说：“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前居住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印度尼西亚《觉醒》周刊1956年第35期）

南下建康的路线

法显登陆于牢山后，南下建康取陆路抑或海路？迄无定论。日本箭内互《东洋读史地图》第12图所载法显旅行路线只到牢山。足立喜六说：“法显于义熙八年七月十四日漂抵牢山之南岸，先至长广郡治之不其侯国（今之即墨县），然后回船返扬州。”（法显传考证》何译291页）足立氏在该书附图《印度洋及中国海海流及季候风》（其二）、《法显上陆地》，均标明法显由牢山再下海绕行长江口抵建康。贺昌群先生认为，法显所乘商船抵达牢山后，“想来又南下还向扬州……法显是不是亦随着去扬州，或舍船从陆路到扬州，都未可知。”（《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第71页）贺先生在这书的《法显西行路线图》中，却也是标明法显从牢山重新下海去建康的。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附图亦取此说。

我认为说法显由海路南下是不确的。第一，《佛国记》说法显到牢山靠岸后，“（长广郡）太守李嶷敬信佛法，闻有沙门持经像沉海而至，即将人从至海边，迎接经像，归至郡所。商人于是还向扬州。”他只说商人遂回扬州，应是未包括自己。他又说：“刘洸、青州请法显一冬一夏。夏坐讫……遂南下向都”。这又说明并非“同时法显亦

向扬州”。第二，法显到牢山，时当义熙八年，是时刘裕已灭南燕两年，长广郡至建康“统属晋家”，法显南下之路畅通，何必再取当时很危险而心有余悸的海路？第三，《水经注·泗水篇》云：“泗水（案源出蒙山，其故道流经徐州）西岸有龙华寺……（法显）东还持龙华图，首创此制，法流中夏，自法显始也。”汤用彤先生也说：“显东还时经此（泗水），并立寺。”他认为“酈道元生长于东土，而元法僧以彭城反叛，道元率兵讨之。其时距法显未过百年，《水经注》所言当可信。”汤先生还说当时刘道怜镇彭城，法显受请到过这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84页）。由此观之，既经彭城，便是陆路，自非水路。此外，设想法显当时由海路抵建康，后又曾北上彭城，虽非绝无可能，但我们不能凭空作此臆测，何况法显到建康后，一直紧张地从事翻译事业，以至年节都日无暇晷，转荆州后，已临暮年，不久就死了，没有再北上彭城的机会。何兹全先生所云：“（法显）至青州长广郡界始得上岸，后即由彭城去建康。”（《魏晋南北朝史略》第128页）此说应是确切的。

《出三藏记集·法显传》说：“（李）巖……躬自迎劳。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此说不知何所根据，其中“贫道”用语粗俗，尤不似法显语言，《佛国记》始终无此自称。后来《高僧传》和《开元释教录》皆沿袭此说。这或对法显南下取海路说不无影响。岑仲勉先生在提到僧传的说法时写道：“似显师卒却刺史之请，但记文则云刘法（洸）青州请一冬一夏，是此冬至明年夏显师均在青州，传言未为当也。”（《佛游天竺记考释》第122页）这是确切的评论。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

法显西行到达信头河（即印度河，此指上游）时，当地僧众曾请教他佛教东渐的时间问题。法显的回答颇有趣味，他据从当地人民的调查访问作答说，相传当地自从建成这弥勒菩萨像，即有天竺沙门赉经律过河传法，时当佛祖涅槃约三百年后，即周平王时期。足立喜六依上说，谓释迦涅槃后二三年末由底迦设弥勒大士像，为佛教东渐之始。足立氏还说法显所谓天竺沙门赉经律过此河，似指迦叶摩腾、竺法兰等东来中国云云。

摩腾之名，最早见于北齐王琰的《冥祥记》，《出三藏记集》从之。竺法兰最早见于《高僧传》。此说明摩腾、竺法兰为宋、齐以前所不知，其译经目录，更不见于两晋南北朝各家经录。摩腾、竺法兰其人其事，难以置信。汤用彤先生说：“最初佛教传入中国之记载，其可无疑者，即为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49页）这是公元前2年，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的事。贺昌群先生认为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的正式记录：“则在明帝永平中（58—75）摄摩腾、竺法兰由月氏来中国，而光武之子明帝的兄弟楚王英亦信浮屠教。”（《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第17页）近代学者、佛学家苏曼殊也说：“至汉明帝时，佛教始入震旦，风流响盛。”（《苏曼殊全集·答玛德利荆湘处士书》）此是公元一世纪中叶，即东汉前期的事。任继愈先生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有佛教介绍到中国来。……从当时整个佛教传

布的形势，中国和当时西域诸国的交通，以及当时佛教传播的状况，可以断定佛教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在公元六、七十年之间是不成问题的，开始传入当在东汉初年。”（《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页）

上述佛教传入中国（实即中原）的时间在西汉末抑或东汉初，可谓史家两种有代表性的传统说法。近来读史中，觉得以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这个范畴说，时间似应更早。如果说西汉末月氏王使在长安向博士弟子景宪口授佛经，抑或东汉初在洛阳的楚王英信奉了佛教，而中原内地的佛教是由西域地区传入的，那么接受天竺佛教者其先鞭，成为向中原传播桥梁的我国西域地区，如南路的于阗，如北路的龟兹，自在长安、洛阳之先了。日人羽溪了谛据《西藏传》和《大唐西域记》所作考证，认为佛教传入于阗的时间为迦湿弥罗国（克什米尔）毗卢折那来于阗建寺传法之际，时当公元前74年。至于传入龟兹的时间，他认为亦远先于中原。羽溪氏立说的依据，诚然多属僧传传说，未必均能采为历史事实，但毕竟事出有因，合乎情理（《西域之佛教》第四、五章）。由此说来，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不是西汉末抑或东汉初，而是大致相当“元狩得金人”的西汉全盛时期，即公元前一世纪前期。

西域诸古国，久为沙漠所淹没，史籍尤缺，文献无徵，澄清天竺佛教传入我国西域地区的确切年代是困难的。在此意义上，羽溪氏上述考证是可贵的。然而，他又说“六朝以前，中国佛教实皆由北印度、阿富汗斯坦、土耳其斯坦及新疆——古代通称为西域之地所贡来者也，此等地方之佛教，当时已繁荣千余年”（《西域之佛教·序》）。^①这就同其前述考证又大有迳庭了。这说明尚需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不拘守于僧传芜繁琐记，着眼于决定佛教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如阿育王和迦腻色迦王恢宏佛教，汉代的开辟西域，于阗、龟兹等古国的消长，尤其出土文物的发现和鉴定，想来可能进一步搞清眉目的。

笈多王朝土地制度一斑

《佛国记》中国^②条说：

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

师子国条则有与上述末段近似的记载：

王笃信佛法，欲为众僧起新精舍。先设大会，饮食僧。供养已，乃选好上牛一双，金、银、宝物，庄校角上。作好金犁，王自耕顷四边，然后，割给民户、田宅，书以铁券。

^①引文加重点是我加的。一笔者

^②《佛国记》几次提到“中国”，皆指中天竺（中印度），而称今日中国为“晋地”或“汉地”。《人民日报》1956年9月14日《中国和锡兰的传统友谊》一文以法显所说师子国“前王遣使中国”指今我国，是不确的。

法显去天竺时，正是笈多王朝全盛时期。笈多朝除了石刻和钱币，缺乏系统的历史文献遗留下来，《佛国记》就成为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从法显上述记载，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印度的土地是王室所有的，土地连同附着在土地上的“民户”，作为采邑封赐臣下或布施给寺院。民户和封建主的关系，有的只交纳贡赋，有的尚有人身依附关系。师子国的社会情况类似，土地为王室所有，“民户”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法显所记，一幅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情景，清晰可辨。

法显记述当时南亚各地情形时，多次将“众僧”与“民户”并提。如那毗伽色条说：“从此东行减一由延，到迦维罗卫城，城中都无王民，甚丘荒。只有众僧、民户数千家而已。”在拘夷那竭城条说：“其城中人民亦稀旷，正（止）有众僧、民户。”又如伽耶城条说：“佛得道处有三僧伽蓝，皆有僧住。众僧、民户，供给饶足，无所乏少。”这里所说“民户”，当是隶属于寺院被奴役的农民，是说明当时南亚各地社会性质有力的资料。这也使我们联系到东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社会上被寺院奴役的农民，特别是北魏时期属于寺院的僧祇户以及南朝寺院蓄养的“白徒”“养女”，其情形是很相似的。此似天竺佛教传入我国的同时，其剥削方式亦见其滥觞。

鄯善古城

《佛国记》鄯善条有如下记载：

（从敦煌）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其地崎岖薄齐。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氍毹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

足立喜六关于这条史料的校释中说：“其国现既没于沙漠中，所在不明。关于其遗迹，异说纷纭，未有定论。”他又说：“总之，凡此皆足证明鄯善国的遗迹，在罗布淖尔之西南，当今之若羌县地方。”

鄯善古城什么时候为流沙湮没，不能确说。《隋书》在记述西域时，没有说到鄯善。《北周书》说到鄯善极其简略。《通典》根据《史记》、《汉书》记述了西汉时期的鄯善，并说“自后无闻”。《北周书》记述了北魏太武时和西魏大统八年有关鄯善的两件事。据此，西魏大统八年以前，鄯善还是存在的，但旧史关于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鄯善几乎毫无记述，所以杜佑说“自后无闻”。《佛国记》这一条史料对于在西魏大统八年后长期为流沙湮没、从西汉后也无闻的鄯善古城的历史，几乎是唯一的记录了。我们应该珍视这一难得的文献。

据法显简短记述，我们可以确知这个被流沙湮没的古城的地理方位、社会文化、人民习俗的基本情况。我们从中看到，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鄯善古城居民的舆服与中原是相似的。考古工作者在罗布泊发现从中原运入的丝织品的残片（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71页），与法显的记述可资互为印证。据上述记述，古鄯善地方接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而这正是由于它在东西交通路线上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

古代斯里兰卡之繁荣

我国载籍中的楞伽、罗刹岛、僧伽罗以及师子国等，都指当今之斯里兰卡。它是南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近代发掘的地下古城阿努拉达普拉，是二至三千年前的古迹，里面有高圆锥式的屋顶，雕刻精美的花板石，精致的神龛。它们和近些年来在全岛各地发见的数以千计的石刻铭文一起，闪烁着古代文明的光辉。

斯里兰卡有文字可稽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四至三世纪，记载斯里兰卡最早的首推印度、希腊和罗马的文献。然而，它们所载只是根据风闻传说。这是不及法显亲自游历见闻的。

斯里兰卡本土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四世纪形成的《岛史》和六世纪问世的《大史》。它们都是具有编年史雏形的巴利文史诗。这两部书，特别是《岛史》，一方面由于出世较早，文字并不纯雅，却接近于原始资料，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一方面它们皆出自宗教家手笔，充满幻术和奇迹，不足采为历史事实者甚多。法显《佛国记》关于斯里兰卡的记述，尽管也免不了佛教神话，但同时又着墨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这是《岛史》和《大史》所不及的。譬如，关于这个岛国开始何以有人居住和繁荣的问题，前者追溯为神话传说，法显则说：

其国本无人民，正（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易市。……因商人来往、住故，
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

法显把古代斯里兰卡之立国和繁荣，归功于商人及其贸易活动，说它地处东西海路要冲，国际贸易中心，商人云集，“遂成大国”。这显然是较为可信的。法显的记载和评论，不只来自亲临见闻，且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据公元初罗马人白里内《博物志》记载，早在克老的由斯皇帝时（后汉光武时）即已常有中国人来这个岛国经商了。

最早的信风纪录

谈及我国古代东西交通路线，人们自然想起的是博望侯通西域，想起的是经流沙，越葱岭，以达中亚、大食直至罗马的“丝绸之路”。然而，我国南洋海路交通亦开辟甚早。据《汉书·地理志》云，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后叶，就有汉使从广东海康、合浦一带下海，绕中南半岛、马六甲海峡、仰光，直至马德拉斯的航行。《后汉书·西域传》说：“自此（安息）南乘海，乃通大秦。”这是关于绕阿拉伯半岛徼外的航线的记载。大致在这同时，罗马人白里内在其名著《博物志》记述中国的事情时也有类似描述。《后汉书·西域传》还说：“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更说明此次抵洛阳的罗马使臣是由南洋海路来的。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东汉安帝永宁、桓帝延熹年间（120—166），也有中国开始取海路绕中南半岛外海，与天竺、大食、大秦进行贸易的记录。又据《梁书·诸夷传》，三国时期海上贸易又有进一步发展。

上述史实，都是中外史籍有关我国海上交通的记载。然而，它们都不曾明确地具体地说到法显书中所说的“信风”。由于季节转换，世界上许多海域有信风，印度洋尤为突出，正如后来王十朋《提舶生日》诗说的：“北风航海南风回”。今天看来，这种平凡的对人类生活无多大影响的自然现象，在古代的帆船时代，却是至关重要的航海动力了，不因时利用信风，帆船下海远航是不能想象的。据近代西人晓夫（Schoff）以及文生（Vincet）等人考证，从公元一世纪中叶，印度洋航海家开始知道并利用信风（《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第127页）。这和我国载籍相合，《后汉书·西域传》说：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

这里所说“善风”，当指信风。这是公元97年的事。我们可以设想，诸如上述公元前二世纪末汉使去仰光、马德拉斯，抑或公元二世纪中叶大秦使臣来洛阳，不利用信风是绝无可能的。但是，从公元一世纪人类知道并利用信风，直至五世纪法显由师子国归航，中国史籍迄未见关于信风的具体记述，不能给人以确切知识。法显书中所说他于公元409年冬初，从多摩梨帝国纵渡孟加拉湾，南下师子国；411年秋末，由师子国东渡印度洋去耶婆提；412年由耶婆提泛海北上青州牢山，都是因时就季节转换期而乘不同方向的信风航海的。法显连续的具体的记载，构成了我国载籍中关于信风最古最系统的历史纪录。

法 显 之 船

我们早已经从文献知道，我国远在春秋时期，吴、越等地就有了称做“船官”的造船工场；和张騫从陆路通西域差不多同时，已有汉使从广东下海出访南洋和印度了。到了三国时代，孙吴在建安（福建建瓯）的造船工场已有相当规模，技术亦很可观，以至能满足下台湾的万名带甲水军的舰队需要（《三国志·孙权传》）。近年来，在广州首次发现秦汉造船工场的遗址。这个工场，规模巨大，工艺亦达相当水平，可建造宽六至八米、长三十米、载量五、六十吨的木船，足资证明秦汉时期我国造船术的生产能力和发展水平（参《人民日报》1977年2月27日《广州发现一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这地下出土文物，成为上述文献的有力佐证。它们雄辩地说明，我国海路交通开辟是很早的，造船术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从春秋到东晋的大约十个世纪，除康泰《吴时外国传》极简略地提到过扶南船外（此书已佚），史籍未见华船和外船的具体记载，它们的形体、设施和技术，皆无从探知。法显在《佛国记》就他回国时所乘师子国船有如下叙述：

即载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船，海行艰险，以备大船毁坏。得好信风……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惟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天多连阴，海师相望辟误……

法显所记，言简意赅，一幅中世纪远洋航船的轮廓，跃然纸上：

载量二百人及其五十天的粮食和淡水，
以信风为动力，扬帆鼓风前进，
依日月星宿判断方向，
大船后系有小型救生船，
设有领航的海师。

上述记载，是我们发现的中国载籍中有关南洋航船的最早最原始的纪录，为世界造船史上所鲜见。这对于后来南洋海路交通和航船的发展，似有深远的影响：

其一，法显身后，从唐宋载籍看，中国造船术有了飞速的进步，船体日大，载量日增，以至于在世界航海史上最早地使用了指南针，直至明代造船工艺和航海术一直居世界前列。

其二，往昔中国商贾、佛僧出海多乘先进的外船，以后变为阿拉伯人、印度人、师子国人多乘先进的华船了。

其三，法显取海路回国后，中外僧人往返中国和印度、斯里兰卡，除玄奘外，一般皆弃陆路而取海路了。

《佛国记》研究现况

法显回国后的第二年，即公元414年（晋义熙十年），写成他的西行游记。后二年，他又作了补充，即跋文中所说“先所略者，劝令详载，显复具叙始末。”

法显的西行游记最初以《佛游天竺记》之名著录于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但何以称法显为佛，则殊费解。因此，有些研究者据隋法经《众经目录》著录的《佛游天竺记》乃西域圣贤所撰，主张《佛游天竺记》系另一书。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则称法显游记为《历游天竺记传》。《隋书·经籍志》以《法显行传》之名著录于史部，又以《佛国记》之名著录于地理部。唐道宣《大唐内典录》、智昇《开元释教录》、园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均袭用《历游天竺记传》。《通典》为避中宗讳则称之为《法明游天竺记》。宋以来《大藏经》称《法显传》。明以来各丛书称《佛国记》，还有称《三十国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行求法的僧人著游记者很多，如晋昙景的《外国传》，北凉法盛的《历国传》，北凉智猛的《游行外国传》，宋昙无竭（法勇）的《历国传记》（一作《释法勇传》），宋宝云的《游履外国传记》，宋道普的《游履异域传》，梁慧超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北魏道荼的《道荼传》、慧生的《慧生行传》、宋云《行纪》等等。这些书都已亡佚，只在《隋书·经籍志》或僧传徒见其目，抑或从《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乃至《敦煌遗书》之残篇断简，散见其节文。只有法显的游记——《佛国记》，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佛国记》有如此独特的生命力，不是偶然的，是千多年来人们看重它珍惜它的生动体现。《佛国记》就其内容而论，是研究佛教史、东西文化交流史、中西交通史、我国西域地区和南亚各国历史、地理、风俗诸领域的重要原始资料。在某些方面，则是仅有的重要文献了。

由于《佛国记》的内容超出了佛教的范围，它不仅为佛教徒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也为一般学术界所重视。北魏酈道元撰《水经注》，多处引录了法显的游记。到了

唐代，将《佛国记》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地理部，复以《法显行传》为名列于史部。唐宋时期，除佛教徒外，对法显游记的重视是不够的。以杜君卿之博学通识，在《通典》中一方面说：“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诸僧传游历传记”，所列诸书，首举法显游记，但他又笼统地批评说：“皆盛论释氏诡异奇迹，参以他书则纰缪，故多略焉。”对于法显游记，他这个批评是不公允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对法显游记，均不著录。即使出自佛家手笔的《法苑珠林》，也说“法显虽外游诸国，传未可依，年月特乖殊俗，实为河汉。”张一纯先生认为这是出于法显重视戒律，译出《泥洹经》后，受到佛教中保守派的排斥和诋毁（《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一辑《法显和他的佛国记》）。此说不无道理，说明法显著作流传下来，固非一帆风顺，是经过了历史磨难的。明清时期，对法显游记是重视的。《秘册汇函》、《津逮秘书》、《说郛》、《学津讨原》等丛中，皆编入《佛国记》。清李光廷著《汉西域图考》，以《佛国记》为主要参考书，并节录了原文。民国初年，丁谦撰《佛国记地理考证》。这是我国研究《佛国记》的最早专著。接着，南京支那内学院刊行了《历游天竺记传》，并做了附注。此后研究《佛国记》的主要著作有：岑仲勉的《佛游天竺记考释》、贺昌群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以及阎宗临先生的《佛国记笺注》（未刊印）等。

在国外，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研究的发展，东西交通史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佛国记》成为研究东西交通史的重要书籍，特别是书中有关各国各族的物质、文化部分，更是头等重要资料。因此，首先为欧美学术界所重视。1836年，巴黎出版佩尔·阿贝尔·雷穆萨的法译本《法显佛国记》，从此传播于欧洲。1877年伦敦和上海出版赫伯特·A·贾尔的英译本《法显佛国记》。1886年牛津出版詹姆斯·莱格的英译本《法显佛国记》。1923年剑桥出版赫伯特·A·贾尔新的英译本《法显游记（公元399—414）或佛国记》。法国的沙畹、伯希和、德国的夏德、苏联的阿瓦林、美国的洛克希尔等，在他们的著述中都常征引或提到法显的著作。

在东方，日本学者堀谦德、羽溪了谛、松本文三郎、小野玄妙等，对法显著作均评价很高。羽溪了谛认为研究久已湮灭的西域地区古史特别是佛教史，最有价值的史料是中国僧人的旅行记，其中首举法显的《佛国记》（《西域之佛教·绪论》）。足立喜六参考了《佛国记》多种版本和有关文献，汲取了各国学者研究《佛国记》的成果，对《佛国记》做了详尽的注释和考证，写成巨著《法显传考证》，这是研究法显游记颇有成绩的著作。南亚各国学者，如印度的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如斯里兰卡的尼古拉斯、帕拉纳维达，如印度尼西亚的甫榕·沙勒等，他们编纂的南亚史书，莫不以《佛国记》为重要的原始史料。他们都高度称许这书的学术价值。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认为，《佛国记》“不独为今日汉学及佛学之重要资料，且系东方学之贵重资料。”他对于日本有日益增多的学者相率加以钻研是书，说“虽嫌其晚，然亦可喜之现象也。”（《法显传考证·序》）印度恩·克·辛哈和阿·克·班纳吉写道：“中国的记载对印度孔雀王朝以后时期的历史的重建是不可缺少的……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他们指出，学习古代印度史的学生必须认真注意法显等人的记载（《印度通史》第一册第二章）。足立喜六称誉此书为西域旅行家及印度佛迹调查者之指南（《法显传考证·序》）。